

光棍 危机

亚洲
男性人口过剩的
安全启示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美] 瓦莱丽·M. 赫德森
(Valerie M. Hudson)

[英] 安德莉亚·M. 邓波尔
(Andrea M. den Boer) 著

邱影 译

贾宇琰 刘哲 译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光棍 危机

亚洲

男性人口过剩的
安全启示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美] 瓦莱丽·M. 赫德森
(Valerie M. Hudson)

[英] 安德莉亚·M. 邓波尔
(Andrea M. den Boer) 著

邱彰 译

贾宇琰 刘哲 译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By Valerie M. Hudson and Andrea M. den Boer

Copyright © 2004 by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The MI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棍危机: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 / (美) 瓦莱丽·M. 赫德森, (英) 安德莉亚·M. 邓波尔著; 邱彰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8

书名原文: 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ISBN 978-7-5117-3058-9

I. ①光…

II. ①瓦… ②安… ③邱…

III. ①男性-人口过剩-影响-国家安全-研究-亚洲

IV. ①C924.3 ②D73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647 号

光棍危机: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 录

第一章 环境与人类安全的性别维度	1
一、方法学	5
二、后代性别选择的产生	6
三、后代性别选择的持续	12
四、结论	20
五、本书的架构	20
第二章 历史上的后代性别选择——从杀婴、堕胎， 到“消失的女性”	22
一、与性别无关的后代选择行为	22
二、后代性别选择	28
三、如何判断性别比例是否正常	29
四、后代性别选择概况	31
五、当代不同文化中的后代性别选择	46
六、亚洲人重男轻女	49
七、消失的亚洲女性	58
八、结论	64
第三章 印度的“消失的女性”	65
一、历史背景	66
二、宗教	68

三、社会制度	69
四、女性的地位	71
五、杀女婴的开始	74
六、公开谴责并试图终止杀女婴	75
七、目前的情况	88
八、过去、现在和未来	122
九、结论	126
第四章 中国的“消失的女性”	128
一、中国和它的人民	129
二、中国的女性	130
三、杀婴的历史及后代性别选择	134
四、20 世纪的变化	142
五、独生子女政策及重男轻女	146
六、上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149
七、性别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	159
八、政府关注过高的性别比例	165
九、婴儿的死亡率	166
十、“消失的女性”及中国的单身汉	170
十一、结论	175
第五章 高性别比例社会中的光棍：理论和案例	177
一、光棍的特征	178
二、光棍的行为倾向	182
三、社会性别比例居高的后果	190
四、高性别比例对女性的影响	192
五、政府的观点	196
六、其他历史案例	209
七、结论	214

第六章 21 世纪的光棍——政策建议	215
一、现代光棍的特征与行为分析	215
二、政府面对光棍问题的对策	227
三、结论	241
第七章 结论：高性别比例社会的安全考虑	244
一、大预测	246
二、结论	247
附表	249
参考文献	263

第一章 环境与人类安全的性别维度

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们长久以来一致认为稀缺性——无论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制造的——是社会竞争与冲突的主要诱因。所谓资源稀缺，可以是具体的，如牛群、水源；也可以是抽象的，如社会地位和族群身份。

几十年来，很少有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注意到这种稀缺性，或者说是竞争与冲突的生物学根源，人们更多关注冷战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冷战的结束给了人们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机会，学者们开始更为全面地思考稀缺性与不平等性在制造国内、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应运而生的是安全研究领域的新分支：环境安全。

安全研究领域的另一个新兴分支是人类安全，在这当中有更为详尽的关于个人安全如何与国家安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讨论。^① 其中学者认为，安全是从下至上、从内而外、个人到个人、家庭到家庭、群体到群体、社区到社区逐层建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外部威胁评估，国家安全还派生于这些微观层面的安全。因此，国家安全有两个参照指标，即国家整体层面的安全和个人层面的安全。两者其一发生

^① 关于这个分支领域的文献概览，参见 Andrew Mack, "The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Background Paper," Human Security Cent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2003, http://www.humansecuritybulletin.info/archive/en_vli2。

变动，势必引起另一方面的深刻变动。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国家整体安全如何影响个人安全，关于个人安全如何反作用于国家整体安全，学者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进一步而言，环境安全分支与人类安全分支之间可能存在的微妙关系也颇为值得玩味。对人类安全学者而言，稀缺性和不平等性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安全。

我们渐渐可以在环境安全领域较为近期的文献中发现这种微妙的关系。国际关系专家逐渐增加了对民族主义、身份认定和移民等要素的关注度，他们开始用这些要素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纷争。1994年，安全学者、环境安全分支的奠基人托马斯·荷姆-狄克森（Thomas Homer-Dixon）指出：“这种资源的稀少，是过去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暴力冲突的触媒，也是未来即将爆发的更大冲突的前兆。”^① 包括荷姆-狄克森在内的很多学者预测，这种暴力活动的增多不仅会引发国内战争，还会导致国际争端。在环境安全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联性问题，那就是稀缺性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为了获得这种稀缺资源，大量的人口将在国界间移动，势必引起不同族群之间的纷争。^② 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安全领域的学者们大量

①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5.

② See, for example, Astri Suhrke, “Pressure Poin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Migration, and Conflict,” Occasional Paper No. 3 (Toronto: Project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cute Confli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March 1993); Alex de Sherbinin, “World Population Growth and U. S.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No. 1 (Spring 1995), pp. 24–29. Sanjoy Hazarika, “Bangladesh and Assam: Land Pressures,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Occasional Paper No. 3 (Toronto: Project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cute Confli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March 1993);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y and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3); and Jeffrey Boutwell and Thomas F.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Change, Global Security, and U. S. Policy,” in Charles F. Hermann, ed., *American Defense Annual* (New York: Lexington, 1994), pp. 201–224.

阐述了由于上述原因而产生的国内和国际争端的案例。近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佐证了环境安全专家们的论证。^① 因此，环境安全这一新兴分支逐渐被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所接受。^②

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的关联性。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资源稀缺性和获得这些稀缺资源的不平等性是不同层面各种纷争的最关键的原因。然而，与其他环境安全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我们不讨论臭氧层空洞和森林退化，我们致力于研究一个对人类安全进程影响更为显著的变量，这个变量至今都没有受到环境安全学者们的重视，

① Mark Levy, "Glob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9 (Cambridge, Mass.: Project on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1994); Joan M. Nelson, "Migrants, Urban Poverty, and Instability in Developing Nations," 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22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69); A. S. Oberai, *Population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Third World Mega-Cit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3); John Walton and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Hans-Georg Bohle, Thomas E. Downing, and Michael J. Watts, "Climate Change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Towards a Sociology and Geography of Food Secur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4, No. 1 (March 1994), pp. 37 - 48; Mark Duffiel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l War: Asset Transfer, Complex Emerg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Aid," in Joanna Macrae and Anthony Zwi, eds., *War and Hunger: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Complex Emergencies* (London: Zed, 1994), pp. 50 - 69; Peter H. Gleick, "Water and Conflict: 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1 (Summer 1993), pp. 79 - 112; Ted Rober Gurr,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carcity and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1 (March 1985), pp. 51 - 75; Shaukat Hassa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Security in South Asia*, Adelphi Papers No. 262 (London: Brassey's 1991);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Atlantic Monthly*, Vol. 272, No. 2 (February 1994), pp. 44 - 81; Michael Renn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Worldwatch Paper No. 89 (Washington, D. C.: Worldwatch Institute, 1989); and Arthur H. Westing, ed., *Global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Strategic Policy and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Steven Greenhouse, "The Greening of U. S. Diploma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1995, p. A6.

而其对稀缺性和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性的贡献是那样显著，这个变量就是，严重的性别不平等。这种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标志就是单纯因为性别而对女性实施的暴力。如果避而不谈“针对女性的暴力”和“社会内部乃至社会之间的暴力”之间的关系，环境安全研究就会大为失色。本研究将会揭开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研究中交叉领域的冰山一角。

目前几乎每个社会对妇女都有某种程度的歧视，例如她们的地位较低，受的教育较少，营养和医疗较为不足，不能够独自作出重要的决定，等等，她们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上的权利都不如男性。然而，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本书主要探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何谓“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呢？就是一个婴儿能否存活，完全取决于他（她）的性别。一种性别能活，另一种性别必死。为人父母者几乎都想有男孩，但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相比男性而言，女性的生命变得毫无价值。^① 父母毫不留情地采取子女性别选择手段，以确保得到男孩。在一个社会中，没有比出生性别选择更能显示性别不平等的证据了。

如果说针对女性的暴力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内部乃至社会之间的暴力的话，那么针对女性的暴力越严重的社会中这种关系就越为显著。盛行实施后代性别选择的社会，例如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38%，由于它们都默许子女性别选择，以致两国15—34岁的年轻成年男性人数远大于同龄女性人数，这种差距已经到了仅凭自然力量无法企及的地步。中国人把这群过多的男性称为——“光棍”。在当今的中国和印度，年轻男女数量上的差距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所以，亚洲性别比例的男性化，是现代最被忽视的一个大趋势，它将影响21世纪的国家乃至国际局势。在中国（个别落后地区——

^① “子女性别选择”不应混同于进化生物学家所使用的“性别选择”一词。前者是指基于性别的选择性生育。杀女婴和性别选择性堕胎是子女性别选择的两个例子。

编者注)、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人为改变性别比例的规模是空前的。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慎重对待亚洲大规模人口变化所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国家,国家安全的涵义要和那些拥有正常性别比例的国家大为不同。虽然“性别”的议题在国家安全的领域中从未获得重视,但我们预测在本世纪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讲到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路径。继之综述有关人类后代性别选择起源的文献。之后我们发掘了为什么在最初诱因消失了之后,后代性别选择还能持久存在的真相,那与特定的宗教习惯和择优而嫁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息息相关。

一、方法学

本研究采用荷姆-狄克森的“验证过程追溯”方法。^①在极其复杂的系统里,社会变量和物理变量同时存在,实证方法要优于证伪方法。当一个变量不确定是否充分且必要时,只有实证方法才允许其还能作为某一现象的一整套充分条件的一部分,被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来。这样的一个变量,可以放大、加强所研究的现象,也可能与其他变量一起引起该现象的发生。

我们的方法学可能不会满足那些希望见到性别比例和国际冲突有线性关系的人。^②我们也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

^① Thomas F. Homer-Dixon, “Strategies for Studying Causation in Complex Ecological-Political Systems” (Toronto: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ecurity Proje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ne 1995).

^② 威廉·狄瓦勒(William T. Divale)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对一个部落人群的案例进行了这样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子女性别选择与好战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然而,学者们继而对他们的方法、数据和理论展开了争论。参见 Divale and Harris, “Population, Warfare, and the Male Supremacist Complex,”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78, No. 3 (September 1976), pp. 521–538。

我们认为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实施后代性别选择的社会里，有着很多冲突，但在没有后代性别选择的社会，也会发生重大事故。因为出生性别选择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且包含多种充分条件，所以唯有的一种包容所有复杂和微小变量的研究方法，才是最适当的。

我们采用“过程追溯”（process-tracing）之后，发现由于性别不平等和环境压力的双重因素，父母被迫选择后代的性别，继之又引发了更大的暴力及冲突。我们通过检验杀女婴和堕女胎的数量来确认性别比例被人为扭曲的程度。为了了解中国和印度年轻人口的性别比例面貌，我们也研究了不同年龄层的性别比例，包括0—4岁的婴儿和5—14岁的青少年分性别的死亡率和自杀率。我们发现处于15—34岁年龄层的年轻男性，与社会内部及社会间冲突的关系最为显著，他们要为近乎全部的犯罪行为负责。

我们接下来回顾后代性别选择的历史根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代性别选择在亚洲尤为盛行。我们发现，最初，后代性别选择是人们对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之举，而之后，这种做法逐渐被宗教和其他社会规范所允许，以至于当最初的环境压力消失之后，后代性别选择仍持续存在。

二、后代性别选择的产生

为什么人类会作出后代性别的选择？为什么它还会持久不衰？历史文献中对后代性别选择的起源和持续施行的原因作了大量的假设和阐述。我们发现在两种环境下——军事侵略和生存环境不利时——父母会被迫作出后代性别选择。所说后代性别选择盛行，是指在社会各个阶层为数甚多的家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采取这种手段控制后代性别，而且即使在违反当时法律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没有受到制裁。这两种环境压力只是引发了后代性别选择从偶然的、个别的转为广泛

的、典型的这个动态过程，我们的研究称之为“恶毒的抵抗政策”。在不利的环境结束后，既得利益者为了永享资源，与传统宗教互相结合，让后代性别选择成为普遍采用的手段。

（一）军事侵略

军事侵略有两个功能：消灭个体生命和消灭社会。一个特定团体的生命灭绝首先是通过男性人数的损失感受到的，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因为他们可以作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族群。赢得战争后，侵略者通常会找出存活的战士和其他的年轻男性，将之处死。

对群体的社会性灭绝，则通过侵略者强掳女性为妾、通婚或为奴。若没有女性繁殖和教育下一代，被侵略的族群会在一代或两代之内绝迹。

因此，防止男性的个体伤亡和女性的社会性流失对于团体的生存极为关键。认清个体生命的损失和社会性流失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会分析到的，有些观点认为，防止女性流失最好的方法就是杀死她们。

军事侵略会导致食物短缺和疾病，会使死亡的阴影从战场上扩大到难民营，给被侵略的族群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尽管军事侵略是被侵略的族群实施后代性别选择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并不是所有族群在遭受外族军事入侵时都会进行后代性别选择。事实上，对族群身份认同产生的威胁——通常伴生于食物短缺和其他环境压力——才是导致后代性别选择盛行的真正原因。^①

至少有三个与军事入侵相关的原因导致了后代性别选择的盛行。第一，为了阻止男性人数减少，族群鼓励生男孩。为了确保男婴的存活，父母通常要投入两年的时间 and 精力，包括出生和哺乳期或是预计

^① 参见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的停经期。父母不希望把精力浪费在养育女婴之上。杀掉女婴后，能让母亲在一年内再生小孩。性别选择性杀婴能够增加母亲在一年内再次生产的可能性，不用等上两年半时间。

第二，女婴会降低族群的抵抗力，威胁其存活。因为为了保护女孩的名誉，防止她们被侵略者掳掠或强暴，常会使得更多的男性丧失生命。所以女性越多，这个团体就变得越弱。因此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人们认为与其失去一些女性和保护她们的男性，还不如不让这些女性出生。

第三，女性需要适当的婚姻对象。为了族群的延续，她们只能从族群中或可以被接受的族群内找寻婚姻对象。但侵略者也会找被侵略的团体中的女性作为性对象，以强暴来摧毁她的道德观及她的族群身份感。为了防御，族群会把女性集中在一个地区保护，但这样会造成一些男性的死亡，也减少了她们可能的婚姻对象。另外，有些有权有势的家庭，不希望他们的财富因为嫁女儿而被分散，所以严格控制女儿的婚姻，但在军事侵略和被占领时，就会造成找到理想的女婿的困难。因此，在种种的考虑下，杀女婴对于一个正在为她的身份而战的族群，代价可说是最小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族群在受到军事侵略时，都会杀女婴。例如犹太血统学就认为，所有犹太女子所生的小孩都是犹太人，所以就算有任何团体成功掳掠犹太女子，她们所生的小孩都算是犹太人。这种情况延续至今。萨格勒布的伊玛目就鼓励波斯尼亚伊斯兰教徒（Bosnian Muslim）去娶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冲突时曾被塞族的军队强暴的女人，也鼓励他们接受因强暴而诞生的小孩，并把小孩抚养成波斯尼亚伊斯兰教徒。^①

还有一种防御的办法，是让这些女性变得对侵略者没有吸引力。

^① 参见 Elaine Lutz, "When the Women Cry, Who Will List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Vol. 14, No. 2 (Spring 1993), pp. 29-32.

中国古代盛行“缠足”，可能就是汉族想阻止女儿被蒙古人掳走；同样的，犹太教让已婚的女性剃光头，也是怕她们被侵略者强暴。当已婚的犹太女性碰到侵略者时，她们会把假发拿开来吓人。更激烈的方式，是把女性生殖器官的外阴唇缝合在一起。

在军事入侵的情况下，与屈服于入侵统治相比，后代性别选择是一种极端压力下的抵抗策略。或者说，这是为了实施抵抗而产生的一种掠夺性社会实践。

（二）长期不利的生存环境

长期处于受到饥饿威胁或遭遇真正饥荒的社会，就会通过后代性别选择对所遭受的风险做出应激反应。自然规律也会对这种脆弱的社会发生作用，让族群的妇女生育能力减低。例如在20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几乎都长期不孕，几年才会排卵一次。妇女要受孕，身体内的黄体素必须维持在一定程度，同时她也需要有相当的体脂肪，若体脂肪长期低于标准，女性就会失去生育力。^①其他自然的避孕方式，例如女性哺乳期的增长及在哺乳期间不得性交，也会被这些社会所采用。^②

在某些类似的社会体系中，女性体重下降的程度不足以避孕。尽管有一些性交禁忌，女性还是可能生出很多孩子，以至于超出该社会体系能够承载的数量。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后代性别选择；与此同时，与性别无关的杀婴现象也会出现。下面就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

① 参见 Richard B. Lee, "Location, Ovulation, Infanticide, and Woman's Work: A Study of Hunter-Gatherer Population Regulation," in Mark Nathan Cohen, Roy S. Malpass, and Harold G. Klein, eds., *Biosocial Mechanisms of Population Regul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21-348.

② 参见 Herbert Aptekar, *Anjea: Infanticide, Abortion, and Contraception in Savage Society* (New York: William Godwin, 1931)。

北极区的人如因纽特人，住在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生存对他们来说，是日以继夜的挣扎，农耕是不可能的，打猎及捕鱼就成为最重要的维生之计。长久以来，这里形成了一种根据性别分工的生活方式。男性专注于打猎和捕鱼，女性照顾小孩、煮菜、做衣服和维护居所。捕鱼打猎在北极是非常危险的，许多男性因此死亡或伤残，但因为没有其他可替代的食物来源，至少在过去是这样的。在两性之间出现的严格的劳动分工，以及男人们在获取食物时体力上的优势，使得男性在族群中更为有用。当家中生男孩时，代表这个家将会有新的猎人或渔人出现，即使家中有男性被杀或伤残，还有人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对因纽特人而言，维持猎人和非猎人（女性、小孩或老人）的人数之微妙平衡，攸关生死。非猎人过多，族群就要挨饿，甚至死亡。也因此，北极的因纽特人族群发展出一个控制非猎人人数的方法。老人会被要求离开，母亲会被要求长期哺乳，以降低怀孕几率，他们也采取杀女婴的方式来降低非猎人的数量及未来母亲的数量。虽然他们今天已经享有现代生活的便利，拥有精密的打猎工具，可是在一些因纽特人部落中，男女比例还是失衡的。^①

在许多社会中，食物获取方式决定了他们是否会杀女婴。如果以打猎、大型牲畜的畜牧和重型器械农耕为主，儿子会比女儿有价值。^②在这样以男性为中心的食物获取体系下，代代实行父居制（patrilocality），妻子不仅在婚后加入丈夫的家庭，而且要和她的亲生父母断绝联系。女性也不被允许继承土地，否则在她们婚后，土地会落入夫家。事实上，女性在婚前即不被视为家庭的成员而是客人，投资在她们身

① 参见 Eric Alden Smith and S. Abigail Smith, "Inuit Sex-Ratio Variation: Population Control, Ethnographic Error, or Parental Manipul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5, No. 5 (December 1994), pp. 595 - 624。

② 参见 H. Yuan Tien, *China's Strategic Demographic Initiative* (New York: Praeger, 1991); and Barbara D. Miller, *The Endangered Sex: Neglect of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North Indi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上是赔本的，“养女儿就像在别人的花园里浇水”。儿子跟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照顾他们的起居，并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因此对父母更加有用。^①

因此，以男性为中心的食物获取体系和父居制结合起来，使得女儿的价值相当低，需要靠嫁妆才能把她们嫁掉。嫁妆制度让父母对女儿原有的一点亲情消失殆尽，因为她们的出生可能让父母破产^②，难怪广东有一句老话：“女儿是贼。”嫁后从夫的习俗、以男性为中心的食物供给体系和嫁妆，这三重威胁使该文化中杀女婴的做法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相反，在母系社会中，女性是主要的食物提供者，例如在产米、养蚕造丝及小动物畜养的社会中，女儿不但不会造成经济负担，反而是重要的资产，而且女性也可以继承土地，男性在结婚时需要支付聘金。1948年解放之前，印度南部就保留着这样的文化，在那里，杀女婴几乎闻所未闻。

当种族遭到军事入侵时，女儿们个体生命的消亡较之其社会性消亡更有利于一个身处脆弱生存环境中的族群。女儿嫁后从夫，对于娘家而言就是一种社会性消亡，对娘家的损失是巨大的，娘家如不愿独自承担这种损失就会要求夫家支付聘金。而有些族群更为极端，他们宁愿选择杀女婴，用女儿的个体生命消亡来减小其社会性消亡的损失。更有甚者，有些社会（比如因纽特人）理所当然地把女儿的个体消亡当成零和博弈的理性结果。他们认为，女儿们无论是刚出生还是长大以后，会威胁到食物供给者和非食物供给者之间完美的平衡。此外，如果一个家庭选择拒绝分担损失和风险，不接受聘金等形式的补偿的话，也是造成杀女婴行为存在的原因之一。

有些情况下，由于拒绝分担损失和风险，杀男婴的现象也偶有出

① 参见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1939; repri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② 参见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